

战争期间日本妇女运动家市川房枝的政治转向

胡 澎

中文关键词： 妇选运动 妇女参政权 转向 战时体制 法西斯军国主义

市川房枝（1893-1985）是日本著名的近现代妇女解放思想家，妇女运动的领导者。爱知县出身。有教师、新闻记者的经历，到东京担任大日本劳动总同盟友爱会妇女部书记。1919与平冢雷鸟创办新妇人协会，1924年12月妇人参政权获得期成同盟会（次年该为妇选获得同盟）成立，任会务理事。1925年成立妇人问题研究所。1937年成立由8个妇女团体的集合组织-日本妇人团体联盟。1940年就任妇女时局研究会的干事长。1942年大日本妇人会成立，任审议员。1942年任大日本言论报国会理事。战后1947年至1950年由于战争期间担任大日本言论报国会理事而被解除公职。复出后任新日本妇人同盟临时总会会长。此后一直致力于日本妇女的参政权、男女平等权利的的实现。五次当选议员，特别是在1980年88岁时以278万选票最高票当选。她的一生跨越了明治、大正和昭和年代，波澜起伏的人生和日本近现代的辉煌与惨败，光荣与耻辱联系在一起，与日本近现代妇女运动更是密不可分。对市川房枝的评价，日本史学界大致有三种观点，一是积极肯定其对日本妇女解放的贡献，但对其战争期间的所作所为予以回避。二是虽然承认其战争期间的责任，但强调其参与战时体制是为实现妇女参政权而做的妥协。三是既肯定其战前、战后为妇女参政权的实现和男女平等所做的贡献，又严肃追究其在战争期间的作为妇女运动领袖所担负的责任。

市川房枝的一生几乎就是日本近代以来妇女运动历程的写照。在战前和战后的漫长历史时期，她始终站在时代的前列，为妇选而奋斗，致力于日本妇女运动。但是在战争期间，当日本站在历史的转折点，目标发生重大方向性错误的时候，市川房枝也未能幸免地被卷入了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的旋涡。本文研究的是她在战争期间的转向问题。众所周知，20世纪的日本妇女运动有两次大的转向，第一次是在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时日本妇女运动和妇女运动家的转向，即在战时体制下从主张妇女解放，妇女参政权运动转向为战时体制服务、支持侵略战争。第二次是1945年日本战败，由对侵略战争的支持转向战后和平和民主主义。本文在这里研究探讨的是妇女运动家市川房枝的第一次转向，重点分析她从“九一八事变”到“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思想的转变，也就是如何由致力于妇女参政权运动转向支持当局战争政策，在翼赞体制下作为妇女运动领袖号召和组织妇女为侵略战争做好后方服务，从思想和行动上支持战争的，并试图通过市川房枝为代表的妇女运动的转向，探求其转向的深层根源。相信对市川房枝的研究，特别是对她在战争期间的政治转向的研究，会对日本妇女解放运动提供些警醒和启示。

市川房枝与妇选运动

一、 妇女思想解放运动与大正民主运动

1918年25岁的市川房枝辞去名古屋新闻社的工作来到东京，开始了她人生的新的起点。这里需要提及的是，以1911年9月《青踏》的创刊为代表的妇女思想解放运动和大正民主运动，这两件事对市川房枝今后的人生产生了很大影响。

接受资产阶级启蒙教育而觉醒的进步女性们在《青踏》这一女性文学杂志上，发出了“原始女性是太阳，是真正的人。而今，女性是月亮，是依赖他人生存，靠他人的光芒闪烁，有着病人般苍白脸色的月亮”的不平呐喊。之后《青踏》由一个以培养女流天才为目的的文学性杂志转变成为妇女问题的专门刊物，充满了对女性经济自立、自我实现和家庭责任难以两全的痛苦，对结婚、家族制度的怀疑和批判。青踏社同人宣传西方的进步思想，批判封建家族主义的旧思想、旧道德，主张自由恋爱，提倡妇女解放，在社会上引起强大震动，由此带来了一场妇女解放的思想运动，开创了日本近代女性运动的第一个高潮。市川房枝在东京结识了平冢雷鸟、与谢野晶子、伊藤野枝、奥梅尾等“新女性”，这对她的今后的人生有着重要的意义。市川房枝之所以最终能成为站在时代的前沿的妇女运动家，成为战后领导日本妇女走向解放的杰出人物，与她这段经历是分不开的。

1912年至1925年的大正民主运动是近代日本著名的民主运动，反映了日本中小资产阶级等中间阶层和知识分子要求实现资产阶级立宪民主政治，反对专制主义统治和扩军备战军国主义统治的愿望。大正民主运动包括两次护宪运动、“天皇机关说”事件、民本主义思潮等。宣扬自由、平等、个人价值的西方自由民主主义思想启迪了年轻的市川房枝，她曾说过“我自然不是思想家，应该说是一个接受大正民主运动的洗礼，极为现实主义的运动家。”她正是汲取着大正时期妇女思想解放运动的营养而成长起来的妇女运动家。

二、“新妇人协会”与“妇选获得同盟”

争取妇女政治权利运动，即妇选运动是以明治时期的自由民权运动时期的岸田俊子、楠濑喜多等提出的参政要求为目标，以初期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今井歌子、（土界）为子等平民社的女性们为撤消治安警察法第五条第二款请愿活动等为契机发起的，而作为妇选运动真正的开始则是以“妇女的社会改造”为目的的“新妇人协会”的成立。

市川房枝强烈意识到日本妇女在社会、政治上都处于最底层的不平等现状，并为此而愤愤不平。她在的自传中记述自己出生的1893年时，她写下了这样的语言：“明治宪法公布四年后，妇女政治活动被禁止的集会及正社法公布三年后”。明治宪法公布后第二年的1890进行了第一届总选举，那一年被称为行使参政权元年，但市川房枝却认为是妇女被剥夺政治权利的元年。妇女没有参政权一直是她所痛苦的，而争取妇女的公民权、参政权、结社权是她所为之奋斗的目标。

1919年11月平冢雷鸟、奥梅尾与市川房枝发起成立了“新妇人协会”，“新妇人协会”可以算是日本最早的妇女运动机构，进行了修改治安警察法和限制花柳病男子结婚为中心的签名运动和讲演活动。这一阶段是争取妇女参政权运动的开端。1921年市川房枝6月辞去协会第一届大会理事的职务赴美学习。她在美国的两年半的时间勤工俭学，十分关心妇女问题，与妇女有权者同盟、全美妇女党的活动家们进行了交流。在市川房枝赴美的前一年1920年美国妇女首次获得了参政权，妇女解放运动处于高潮阶段。当时美国妇女解放、消除男女差别的运动和美国妇女的积极态度深深感染了她，对她今后的妇选运动产生很大影响。1922年12月由于各种原因“新妇人协会”在历经仅一年半的时间后解散。

妇人参政同盟于1923年2月结成，但由于团体之间步调不一致，活动处于停滞状态。1924年初回国的市川房枝参与了同年12月13日妇人参政权获得期成同盟成立大会，当选为会务理事。创立初会员约200人，以津田梅子、矢岛楫子、生田花世等知名的女性为首。

妇人参政权获得期成同盟在《宣言》中表现了她们为获得妇女的正当权利而奋斗的决心。

“我们决心打破两千六百年的旧习，男女共同享有天赋的义务和权利，担负建设新日本的责任；从明治初年开始，在长达半世纪的国民教育上已经没有了男女差别，伴随女子受教育大门的逐步打开，今天，在即将实行普通选举法之际，把女子排除在外是不公正的，我们要求女子的选举权；我国职业妇女已达 400万，为保护其利益，要求参政权是理所当然的；我国大多数家庭妇女为了完善生活，在法律上应成为国家的正是一员。我们要求如此；我们要求获得市、町、村的公民权、国家公民权的资格，我们认为妇女参政权是必要的。我们排除宗教歧视、职业歧视等所有歧视，以女性的名义达成统一，精诚团结，我们相信妇女参政权运动是必要的，其成功也是可能的。”

1925年 3月通过了男子普通选举法，但女性仍被禁止参加政治结社。1925年 4月 19日妇人参政权获得期成同盟改称妇选获得同盟。妇选获得同盟围绕女性的公民权、参政权、结社权的要求，针对议会开展了各项活动。1927年 1月开始发行机关刊物《妇选》，市川房枝做主编，她在每期都发表文章，阐述妇女争取权利的想法，为推动妇选运动发挥了积极作用。

妇选获得同盟为妇女参政权的实现，十分重视针对议会的运动。1927年与其他妇女团体结成了妇选团体联合。1929年、1930年、1931年议会期间的妇选运动是日本妇选运动的高潮，展现了日本历史上妇女运动光辉灿烂的一幕。1929年妇女公民权法案虽遭到否决，但它首次被上呈参议院，受到世人瞩目。1930年 4月第一届全日本妇选大会召开。妇选获得同盟从妇女的立场开始了改革选举中不良现象的运动。她们在 17个县开始了游说活动，听众达到 1万 4千人，市川房枝在其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在第 59届议会上，妇女公民权法案由政府提出，但妇女的公民权只限于市、町、村，不限于都、道、府、县议员的选举和被选举权，而且规定妻子被选举要事先经过丈夫的许可。这一限制性的妇女公民权受到市川房枝等人反对。但即便是这一限制性公民权法案仍在贵族院遭否决。妇选获得同盟 1931年 4月的大会确定了实现“完全的妇女公民权”的运动方针，截止到 1931年的前半期进行了积极的活动。

妇选获得同盟（成立时为妇人参政权获得期成同盟）从 1924年成立到 1940年解散的 16年，正是战前政党内阁时代（1924--1932）到 14年战争（1931-1945）的时期，以市川房枝为领袖的妇选获得同盟尝试了各种各样的活动，如到帝国议会请愿、通过发行机关杂志《妇选》进行启蒙活动，举行集会、签名等示威活动。妇选获得同盟从刚成立时的约 200名会员，1931年增加到 1762名，并成立了众多的支部，对于妇女地位的提高和唤醒妇女参政意识起到了不容低估的作用。但妇选运动有其天生的局限性，日本女性一直深受封建家族制度的束缚，近代以来又受资本主义的压迫，这二重的压迫使得她们的运动不可能是彻底的，运动的规模也没有扩展到大多数妇女中间，而只是一部分小资产阶级妇女的运动。日本史学家村上信彦评价道：“这一妇选运动成了为了一部分精英运动的运动，很有可能从国民的实际生活游离出去。”这 16年期间，日本的社会运动由高潮逐渐衰落，以市川房枝为代表的妇选运动也由于战争的不断扩大化而变得目标越来越难以实现。

市川房枝的政治转向

一、“九一八事变”时期的市川房枝

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意味着以“大正民主运动”为代表的“民主时代”向“战争和法西斯时代”的转折。“九一八事变”对市川房枝来说意味着她一直以来所从事的妇女参政运动已经走到了尽头。从1931年11月18日的《东京朝日新闻》上我们可以看到，“九一八事变”后妇选获得同盟等女权组织站在母性的立场上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市川房枝也是站在绝对和平主义的立场上反战的。她在1931年11月号《妇选》中《国际和平和妇选—写在满洲事变之际》中这样写道：“满洲事变从爆发到现在已经一个半月了，尚未解决，维持旧有状态进行着军事占领。我们为此感到颇为遗憾。（略）为了解决国际纷争，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赞成行使武力。我们相信战争不仅仅是经济上的浪费，牺牲众多的生命才是最大的罪恶。战争让交战的两国国民感情越来越疏远，为将来种下了祸根。”市川房枝从女性的立场出发，认为“战争直接给予最大伤害的人是妇女”，希望“事态尽早解决”。对“九一八事变”后急剧发展的法西斯主义，市川房枝针对议会否决、反对妇女获得参政权进行了回击。她为早期结束战争，曾呼吁，日中两国女性找到一条“携起手来，密切合作的道路是至关重要的”。

这一阶段市川房枝批判战争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一是担心军部独裁可能导致的法西斯政治。二是出于一种女性的本能反对战争。三是认为“九一八事变”是对妇选运动的冲击。在1932年5月28日召开的第三届妇选大会上，第三个议题采纳了“我们站在妇女的立场坚决反对目前抬头的法西斯主义”的决议。然而，“九一八事变”之后妇选运动的社会环境变得越来越不容乐观了。首先在否定议会政治的风潮中，提出妇选议案是十分困难的。其次，一些诸如大日本国防妇人会、大日本爱国妇人会、大日本联合妇人会等官方的妇女团体几乎网罗了全日本的妇女，妇选运动陷入了低谷。

二、“卢沟桥事变”时期的市川房枝

1937年以“卢沟桥事变”为开端的日本侵华战争进入了全面化，日本迎来了一个迅速法西斯军国主义化的时代。“卢沟桥事变”改变了日本国民认为战争只限于中国国内的一小部分范围的想法，1937年9月日本国内开始了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这一思想运动的目的是在最大限度集中军事力量，为扩大侵略、充实军备之外，加强对日本人民的思想控制，限制国民的言论、集会、结社等自由。口号是“举国一致、尽忠报国、坚忍持久”。1940年7月近卫内阁第二次组阁，制订了《基本国策纲要》，在国内开展了建立政治和经济的新体制运动，建立了大政翼赞会。近卫新体制就是典型的日本式法西斯统治体制。在这样的时代大潮中，一直处于时代前沿的妇女解放运动家们无可逃脱地面临妇女运动是否转向的问题。

市川房枝在“卢沟桥事变”之前一直在为妇女获得参政权而斗争着，“卢沟桥事变”的冲击使得市川房枝陷入了深深的忧虑和彷徨之中。她在自传中这样写道：“看到卢沟桥事变爆发为起点的全面中日战争向前推进，我陷入深深的忧虑。到现在我在可能的限度表示了反战的意思，招致了军部的攻击。我准备一边显示出对政府的、自治体政策的支持姿态，一边为在其中加入我们的要求而苦心为之，目的是在一定程度下达成我们的目的。但是，这次的现实是战争已经开始了。在这个时刻，是正面反对战争被关进监狱，还是妇女运动全面退却，再或是暂且先认可这一现状进行一定程度的支持，应该选择哪条道路呢？”

市川房枝在1937年《女性展望》9月号上著文写道：“象现在这样的形势下，所谓妇选—修改法律运动不用说更增添了一层困难。然而我们妇选要求的目的是站在妇女的立场，以为国家社会做出贡献为目的，与政府与男性齐心合力而奋斗”。

事变两个月后，收音机、报纸传来的战况一天比一天激烈。市川房枝又写道：“这两个月间我完全陷入忧郁。因为爱国，为这一不幸的事变的发生而悲哀，战争扩大的程度、事变后的对策、经济上的影响 ---- 等等无法预测。但是，既然已经进展到这个地步，只能向前发展。我们必须意识到，物资不足、战争军费的增加导致的物价飞涨。生活的困难是自然要到来的。我个人的感情啦、生活啦不管怎么都好应付，但是为了全体妇女、孩子们，乃至国家社会的幸福，站在多年与同志们一起努力共同立场上，无论如何也要克服艰难的时局，考虑到建设将来的幸福生活，有实行转向的责任。”

市川房枝看到当时的情况，不得不承认：“在这一时局的急变，政局的瞬息万变的转折之际，由民政党和政友会的有志议员向政府提出的妇女公民权法案不用说已经成为不可能的事了”。在经历了一番矛盾痛苦的心理斗争之后，市川房枝在为了国家和妇女的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的驱动下，放弃了妇选运动，开始转向加入推进战争的体制，支持战争，从而幻想最终达到妇选的目的。

翼赞体制下的市川房枝

市川房枝以“卢沟桥事变”为契机，开始了她的转向的第一步，也就是结成日本妇人团体联盟。1937年9月28日成立日本妇人团体联盟是站在妇女的立场构建的总动员体制。此联盟汇合了——一直参加妇女参政权运动的日本基督教妇人矫风会、全国友之会、妇人同志会、日本女医会、基督教女子青年会日本同盟、日本消费组合妇人协会、妇人和平协会、妇选获得同盟这8个妇女团体，市川房枝领导的妇选获得同盟是其中的核心组织。随着战争的全面化，1937年后半年的妇女运动开始转向送行出征海外的士兵、慰问军人遗族、向国防捐献的后方活动转变，日本妇人团体联盟也毫不例外。日本妇人团体联盟其实就是以加入总动员体制为目的的组织。

日本妇人团体联盟宣言是这样写的：国家总动员之秋，我们妇人团体希望能够支持、巩固后方，现发起结成日本妇人团体联盟。我们宣誓坚持到底，达到目的，期望我们的精神能够感染全体妇女，克服非常时局，发挥女性真正的价值。这一时期的市川房枝是通过妇人团体联盟的结成，从妇女的角度，在体制之外选择了向政府合作，支持政府的道路。日本团体妇人联盟的主要活动有：反对重新让妇女从事坑道作业；发起禁止与花柳病的男性结婚的请愿；掀起“浪费就是敌人”紧缩消费的节约运动。这些运动有些是当年平冢雷鸟发起的运动的深化。

在1937年10月12日精神动员联盟发起后，市川房枝在“公职”中就职可以说是她转向的第二步了。按时间顺序，她担任的主要公职的如下：精动中央联盟调查委员会委员（1937, 12）、非常时国民生活样式改善委员会委员（1938, 6）、厚生省国民服制定委员会委员（1938, 11）、大藏省奖励储蓄女性讲师（1939, 3）、国民精神总动员委员会干事（1939, 3）、国民精神总动员中央本部参赞（1940, 4）、大政翼赞会调查委员会（1941年5月）、大日本妇人会审议员（1942, 2）、大日本言论报国会理事（同年12月）。战后市川房枝被解除公职就是因为担当了大日本言论报国会理事。这是一个凡是与言论有关的人的组织，德富苏峰是会长，市川房枝是其中唯一的女性理事。在这一系列的官职中，市川房枝领导着日本妇女们进行了对政府当局的支持。

近卫新体制运动时期，众多的团体和组织被解散，被统一到翼赞体制之中。例如：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社会大众党解散后，加入了大正翼赞会；劳动公会、农民工会等组织也陆续

解散，被统一到产业报国会等各种官方的国民运动组织里；市川房枝的妇选获得同盟也解散了。妇选获得同盟的解散标志着 16年的妇选运动历史落下了帷幕。市川房枝在同盟解散后又在筹划新的开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市川房枝在妇人时局研究会领域，依然没有放弃支持体制。

市川房枝政治转向原因的思考

一、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的高扬

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时，向国民灌输一种美化侵略战争的实质，为侵略找寻理由的思想意识。即在 19世纪到 20世纪的弱肉强食的年代，为保全日本的国家独立，致力于建立近代国家，只能走成为西欧帝国主义的追随者的道路。军事发展成为近代日本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做“大东亚共荣圈”盟主成为近代日本全力追求的国家发展目标。在这一思想意识影响下作为亚洲国家的日本，以帝国主义国家的面目向亚洲诸国扩张势力，走上了侵略之路。

伴随着法西斯军国主义和对外侵略的步伐，日本政府从战争初期开始就意识到综合战是离不开日本国内妇女的支持的，积极推进女性的组织化。在政界、军界的号召和组织下，成立了许多妇女团体，直接为战争服务。如 1932年成立的前身为大阪国防妇人会的大日本国防妇人会。1937年妇人矫风会等 13团体结成的日本妇人团体联盟，1942年成立的大日本妇人会等。战前成立的以爱国妇人会为代表的一些妇女团体也将目标转为为战争服务。这些妇女组织的成立以及行动并不是妇女自发的为追求男女平等妇女解放而进行的运动，而是被动员、被组织、被利用为当局的政策服务的运动，是背离日本女性的利益和给女性带来惨重伤害和巨大代价的一个历史性的错误。

在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思潮成为一种社会的主流思潮以后，对它的反抗和抵制似乎成为一件不可能的事情。战前的日本也没有出现与以共产主义运动为中心的反战运动相区别的包括自由主义者在内的广泛的和平运动，1937年以后只有“非法”的共产主义运动成为反战的可能力量，但遭致法西斯军国主义高压政策而被窒息。战败前的日本社会缺乏表达合法的反战和平运动的渠道。妇女运动更是如此，“九一八事变”后妇女运动家，除宫本百合子以外都表示出“暂且认可战争的姿态”，幻想在此基础之上来提高女性的地位。“九一八事变”以来一直抵抗法西斯主义的市川房枝也明显受到了来自卢沟桥事变后的压力，转向支持战争。

二、对妇女参与战争体制的幻想和领袖意识

“九一八事变”以前的日本妇女运动走的是一条摆脱封建束缚，争取妇女参政权，实现男女平等的道路，“九一八事变”特别是“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妇女运动逐渐偏离了其目标，性质也发生了变化，逐步走上了一条完全背离妇女运动发展方向的歧途。这其中以市川房枝为代表的妇女运动领导者有着不容推卸的责任，而市川房枝对政府转向支持与合作的一个很大原因是她对妇女参与战争体制的幻想和她的领袖意识。

市川房枝对自己在战争期间参与体制有着这样的辩解：“战败后我作为支持战争者受到 3年 7个月的整肃。某种程度上支持战争是事实，我认识到这一责任，但是我并不认为是名誉的。例如虽然我的朋友们中有在战争开始后，就跑到山里隐居饱食终日那样的人。战争结束后他们回来，说自己没有参与支持战争。但是我在那个时代，那样的状况下，作为一介

国民，虽然不能说理所应当这样做，但我并不感到羞耻，也许是我错了吧。”市川房枝对自己参加战争体制是有一套解释和说法的。她认为首先是为了保护战争时期妇女和孩子的生活，第二是通过参与国家政策来获得妇女参政权。

市川房枝在当时选择参与战争体制，源于她对妇女参与等同于妇女解放的幻想以及妇女运动领导者的领袖意识和自觉。她在其自传中记述了自己战时的心态。“我作为所谓国策妇人委员，是把政府的行政及外部团体的妇人的参与看作是妇女的政治参与—妇女解放的道路来推进的”。“参与—解放”的理论是市川房枝参与战争、支持战争的最大理由。1937年8月在她访问爱知县农村时，看到村小学成立国防妇人会分会，认为国防妇人会的干部们有不少在活动中发现了新的自我。认为从前很少当众讲话的妇女，由于参加了国防妇人会而发现了自己的潜能。她说“过去没有自己时间的农村妇女，半天从家庭中解放出来听讲演，仅就此点就是妇女的解放。”她还在《市川房枝自传》中写到：“国防妇人会的妇女们精神抖擞地走向社会难道不是一种妇女解放吗。”将妇女参与战时体制与妇女解放等同起来。

在妇女运动家看来战时体制下总动员体制是解决妇女诸多问题的良好机遇。战时体制下，由于劳动力不足使得过去许多由男性来做的工作不得不让女性来承担。大量女性劳动者成了补充劳动力。当时的妇女们因为战争和非常时期而得到这样普遍的就业机会。市川房枝等妇女运动家认为，总动员体制可以扩大妇女参加社会劳动，可以在政策和法律上加强对母亲的保护。女性广泛地参加社会、经济活动可以提高她们在法律上、政治上的地位，对妇女参政权的实现，发挥女性的能力是一个绝好的好机会。总动员体制受到市川房枝的响应，她认为，女性参与战时体制，支持日本当时国策，“开辟了妇女参加行政的一条道路”；“实现了我们多年的希望妇选的一部分”；“在可能的范围内应该利用这个。”

市川房枝认为妇女应该从封建的、父权家长制之下解放出来。她的妇女解放观不是以阶级解放为途径的无产阶级女权主义观点，而是从市民的民主主义出发来从事妇女解放的。她对妇女解放运动的视野也是狭窄的，只考虑到自己本国的女性，而没有一种世界的眼光。没能真正认识到这场战争的侵略性质，对于同样身为女性的被侵略国家的妇女缺乏应有的同情。

市川房枝思想、性格、行动上都完全具备了妇女运动家的魅力。她是一位有着强烈责任感的人，且有着很强的目标性。她作风果敢、行动迅速，一旦决定了的事情，便会全力以赴。浓厚的领袖意识也是其突出的特征。这些特征决定了她不管是在怎样的历史条件或政治环境中，她都会是站在时代潮流的最尖端，乘着时代的浪潮向前的人。然而这种领袖意识也有其致命的弱点，当日本处于法西斯军国主义的统治体制之下。市川房枝也无法不顺应时代的潮流，转向对翼赞体制的支持。历史似乎在惊人地重复着，日本战败后的1945年8月20日市川房枝等妇女运动家还没来得及对战争进行反思，就成立了战后对策妇人委员会，开始向战后组阁的东久迩内阁要求妇女参政权。在之后的民主改革以及和平年代的经济发展的时期，市川房枝重新又站在了时代的前沿，带领日本的妇女在为实现男女平等社会担当了旗手的职责。

三、天皇制民族主义

市川房枝在战争期间转向的原因之一是天皇制民族主义对她的影响。1903年至1907年当时市川房枝还在读高等小学期间，爆发了日俄战争。日俄战争后日本国内民族主义情绪高涨，日本是神国这一意识对市川房枝影响很大。她曾在《妇人展望》上写道“我以前是一个

非常忠君爱国主义者”。可见在她思想深处一直潜存着“天皇制”国家的意识，到了战争期间随着战局的发展和法西斯军国主义思潮的高涨而萌芽、膨胀起来。

三、四十年代日本法西斯主义猖獗时期，政府极力宣扬日本的“国体”以及“国体思想”。即日本是神国，天皇是神的后裔，初代天皇是日本民族的祖先，“天皇万世一系”，“君民一体”。渲染日本民族和日本文化的优秀、诋毁其他民族的极端民族主义思潮直接导致了日本国民的自我认识和对亚洲的认识发生严重偏差；导致了民众对天皇发动的“圣战”的支持。市川房枝是明治以来教育方针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对天皇的绝对权威的膜拜和服从造就了日本战时体制下的妇女运动方向的扭转。天皇制民族主义、国家主义都在市川房枝内心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市川房枝将自己对日本妇女解放的梦想与“国家”和“天皇制民族主义”联系在了一起。这是市川房枝个人的悲剧，也是日本妇女运动的悲剧所在。当国家在法西斯军国主义车轮的带动下走向歧途的时候，市川房枝和以她为代表的妇女运动便不可避免地一同走向了歧途。

市川房枝是日本著名的近现代妇女解放思想家，妇女运动的领导者。在战前和战后致力于日本妇女解放运动。但是在战争期间，加入了法西斯军国主义的战时体制，战后曾为此一度受到解除公职的处分。本文在这里研究探讨的是 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时市川房枝的政治转向，即从如何由致力于妇女参政权运动转向主张妇女解放，妇女参政权运动转到从思想和行动上为战时体制服务、在翼赞体制下号召和组织妇女支持侵略战争的，并试图通过市川房枝为代表的妇女运动的转向，探求其转向的深层根源。

作者简介：胡澎 女 1966年出生毕业于日本富山大学人文科学研究科，获文学硕士。
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研究领域：日本当代女性、日本近代女性史